

# 經濟



# 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整合過程\*

*Gabriela César\**

今天，談論澳門經濟而不涉及中國經濟、尤其是廣東地區經濟是不可能的。

確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放政策為澳門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打開了一個新紀元，這種關係正調節着澳門的經濟發展。

一切由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開始。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對外開放和現代化政策、鼓勵投資，中國政府派出多個由經濟學家和計劃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出國訪問，學習和研究所謂“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擴大出口，亞洲東部和東南部所有國家和地區（日本、澳門、香港和新加坡除外）均建立了“出口加工區”，外國企業可在該區內進口原材料、生產外銷產品而無任何關稅障礙。

澳門、香港和新加坡，由於內部市場匱乏，以貿易壁壘作保護無任何意義，因而不必建立自由區。

日本相信自己戰前的技術力量，而且對外國統治十分敏感，認為可以通過教育和先進技術實現現代化而不必邀請外國企業建立特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自己的經驗，為達到下列目的，決定建立經濟特區。

（一）：首先，也許是最主要的，是為了從特區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如其他發展中國家已建立的“自由貿易區”、“特別工業區”和類似的邊境特區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建立經濟特區是加速出口加工企業發展、增加當地就業和吸收外資的手段。

---

\* 1992年在里斯本舉行的研討會上的報告“澳門在珠江三角洲的使命與機遇”

\*\* 澳門經濟司司長

此外，也為長遠目標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特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區不同，它不限於外資進行小規模的裝配和加工，而鼓勵其對基本建設大項目也作投資，如興建公路、供水系統、機場和港口。

（二）：第二個目的，計劃專家們將經濟特區作為向全國其他地區引進外國技術、知識和經營管理的橋樑。

推行地區經濟發展僅是政府政策的一個方面，由於特區在全國發展規劃上起作用，因此，有助於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運動。

（三）：經濟特區的第三個作用是可作為教育和試驗中心。由於地理位置的隔絕，經濟特區可作為經濟發展的“溫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易控制的範圍內取得與資本主義經濟相聯系的經驗、對經濟改革進行試驗，然後在國內其他地區推行。

中國報刊多次談到這一點，稱經濟特區為“示範項目”，有一位作者這樣寫道：特區為經濟全面發展提供試驗場，使基礎設施、工業項目、建設、旅遊、外國投資和法制現代化協調一致。

1980年8月，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最早的經濟特區在廣東省正式建立。隨後，在福建省建立了廈門特區。八年後，1988年4月，又建立了第五個——海南經濟特區。

中央政府選擇廣東地區建立第一批經濟特區，除了為其政治目的服務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理位置。

首先，特區位於沿海，為進口原材料和向國際市場出口加工產品的理想地點。其次，廣東為僑鄉，因而，對華僑投資商具有特殊吸引力。能有機會參加祖國建設又能取得投資利潤，對許多華僑富豪來說，是既有感情因素又有實際效益的事。中國人給他們一個稱號——愛國資本家。

最後，由於毗鄰香港——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貿易中心和港口之一，就方便經濟特區的投資者利用香港的基礎設施。

一切迹象表明，選擇第一批經濟特區的地點也出於中國統一的政治因素的考慮。澳門、香港和台灣是珠海、深圳和廈門經濟特區最易達到、最合適的基點。

因此，可以認定，中央政府選擇澳門近鄰、沉睡的漁鎮珠海作為經濟特區之一不是偶然的。

1980年，澳門經過十年的迅速增長，具有人均收入中等的經濟和外向型的生產結構。

七十年代，製造業方面，表現為紡織業、服裝業的急劇增長。

服務業方面，與博彩密切關聯的旅遊業成為本地區經濟最活躍的環節，而其他行業則較落後。

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住房和工業設施的需求，房地產的發展速度也頗可觀。

然而，澳門七十年代之經濟現代化，得益於香港者多於本身內部之發展。

事實上，澳門重要工業出口行業之出現緣於香港生產轉讓過程，由於香港向國際市場推出產品時面臨困難，主要由於紡織出口品配額限制問題。

這裏需要強調指出，香港企業家在澳門找到了良好的投資條件：勞動力充足而價廉，當地少數企業家可與之合股經營，有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系，其特徵是商品和資金可自由流通，監督和行政管制較寬鬆的。

再則，由於採用了水翼船，香港與澳門之間之旅程，由四小時縮短為一小時，因而，為賭博而來的遊客大量增加，從而酒店業也大為興旺。

早在七十年代末、特別是八十年代初，玩具、人造花和皮革製品等新出口行業的出現，掀起了香港企業家投資的第二浪潮，他們因全面優惠制使他們在這些出口品方面的利潤減少了。

八十年代，在基礎設施如電訊、電力、供水和公共衛生方面大力改善的同時，不僅在工業而且在其他服務行業也出現了生產結構多樣化。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先是紡織業繼而相當主要部份的新工業的發展出現明顯逆轉。下面，我們不妨觀察一下邊界另一方所發生的事。

經濟特區和整個廣東地區交通和通訊工具改善後，外國在該地區投資迅速增長。八十年代初，澳門到廣州之旅程需要一整天，包括五次渡船，可見當時困難之大。

1988年，最後一座亦即最大一座橋樑建成後，旅程縮短為三至四小時。香港與廣州之間亦然。

以往，廣東與澳門接通一次電話需要等候數小時，八十年代中期，兩地各旅館、企業和公共服務業之間可直接通話。今天，該地區公民可與十多個國家的十多個城市直接通話。不久前，還出現了手提電話服務。（參閱北京週報，1991年4月8日至14日）

初期，經濟特區吸引外資最多的行業為旅遊業，因為該活動需要勞動力多、收效高、資金回收期短。

此類投資受中國當局青睞，因為北京中央政府或廣東省地方政府無需注入大量資金，也備受港澳投資者歡迎，因為只要對此行業作初步投入，便可更好地測試經濟特區之投資氣候。

自1978年北京宣佈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以來，澳門的企業家便成為珠海的主要投資者。有趣的是：第一個旅遊合資企業是與澳門合營的，即1980年10月於珠海建立的石景山旅遊中心。

隨着該地區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的增長以及眾多西方人對廣東省及中國其他地區的投資繼續存有疑慮（如僱用和解僱工人、資金回收、避免始料不及之費用、中國人不守約時如何解決問題等）之時，香港和澳門之企業家充份利用了機會。

西方人需要通過法律條文採取防禦措施，而來自香港澳門的投資者得益於中國國內親友之間非正式的關係網而在經濟特區及廣東其他地區早已佔據了重要地位。利用地價低廉、勞動力廉價、原材料供應有利等方便條件，八十年代後期，澳門和香港需大量勞動力的工業生產便轉移到了近鄰的內地。

顯然，香港和澳門的資本的大量輸出影響並引導了中國南部地區經濟和實力的增長，複製出一個具有同樣特色的經濟模式，即在出口工業中，以不熟練勞動力為主的工業佔突出地位（如紡織業、製鞋業、玩具業等）。

因此，由於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包括廣東省三個特區及其附近地區進行經濟整合，澳門經濟（與香港正在經歷的某些方面相類似）正在經歷一個產業結構深刻變革的過程。

在澳門，工業部門失去其相對重要性之時，旅遊業用於興建新旅館之投資增加了。1992年，旅遊收入可望超過商品出口總值。1982至1987年間出口商品平均增長值為10%，而最近四年下降為2%。

工業系統在八十年代初吸收百分之五十有勞動力之人口參加工作，今天，只吸收三分之一。

澳門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在變，從而其生產結構也要變。造成了新的競爭和互補關係。

勞動力密集的工業部門的競爭，如玩具業、人造花業、陶瓷器業、傢俱業，這些產品在國際貿易上相對自由，中國亦享有一定的優惠，而僅澳門享有普遍優惠制。

中國經濟啓動之時，正值澳門採取措施限制來自中國移民政策之際，加之第三產業的擴大，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工業生產轉移過程。

上述領域內之互補關係，澳門在此領域已不從事生產，然而繼續提供或與香港共同提供為生產和出口服務之補充項目，如質量檢查、包裝、談判、市場、調研、設計、貿易和為出口提供資金等。

產品生產上之互補關係，由於國際貿易受制於配額，要求本地勞動的參予，產品暫時出口到中國進行部分加工。

最後，所謂“三角貿易”之互補，或者說，當產品生產國的產品不通過澳門而直接由中國出口或經香港轉出口時，澳門只起進口國與中國之間的中介作用。

上述活動產生之收入，部分回流至澳門，但不表現於統計數字，即不見之於澳門的國民生產總值統計。

必需指出，最近香港報刊對廣東地區學術界發表的論述作出了反應，這些論述認為，隨着地區整合過程的加速，香港的“當地生產總值”已越來越不能成為衡量和說明該地區經濟結構和發展的標誌，因此呼籲在計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當地生產總值”時應包括港、澳、穗三個城市。

貨幣流通狀況值得一提。一般情況下，以M2表明的貨幣流通增長速度應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名義增長速度相符合。最近幾年，澳門未發生此類現象。

1988年至1991年，M2的增長率約為30%左右，而國民生產總值的名義增長率平均下降至16%，這說明財富積累的速度極快，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此狀況明顯表明收入分配不均衡，經濟增長只有部分成爲消費增長。

然而，投資不僅澳門向中國單向流動，而是雙向流動。最近幾年，中國在澳門之投資亦頗爲可觀，在各行各業十分廣泛，如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賓館、酒店和進出口貿易，加強了區域性經濟的互相依賴。

從而，以嶄新的現實進入了九十年代。

香港澳門在珠江三角洲生產加工的擴大，使廣東成爲中國最發達的省份，成爲國內工資和收益最高的地區。

於是，進行新的、大膽的區域性投資的條件已經成熟，包括對基本建設和新興行業的投資。

無論是由於積極投資之反響抑或由於民間消費之增長，內部需求在迅速擴大，明顯表現在消費者尋求更多進口產品。

當然，該地區和國外的商品交易也在加快，中國不久將重新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如果說，1978年中國宣佈對外開放政策時，西方人已看準具有巨大消費力的、億萬人口的廣闊市場，對其優越性有所領悟，在經濟特區建立了出口加工工業，那麼，今天，他們要在數年前難以想像和不被認識的新的貿易機遇面前，重新建立紐帶。

這方面，澳門具有深入該地區的戰略地位，能起主要作用，澳門商人與其他國家比較，有多年和中國進行貿易而取得成功之優勢。

澳門全面開放的小型經濟的運作，受制於外部因素和無法控制的限制，需要迅速而靈活地進行內部調整、以期能使一切機遇“資本化”，或面對變化多端的外部局面而應變。

我們已經看到民間企業如何調整以面對新現實。同樣，在整個新發展過程中，政府也改變了自己的作用。

根據聯合聲明規定，澳門之主權將移交，目前正處於政治過渡。形勢之複雜性要求擬定一個明確的戰略方案，在鞏固政治、司法制度之同時，經濟現代化之挑戰應佔有突出地位。

政府應重視基礎設施和人材的培訓，使經濟發展不受阻而得以加強。

在整個複雜然而激勵人心的過渡時期中，澳門在電訊、電力、垃圾處理和交通網方面應進行基本建設，交通方面之投資尤爲突出，如當前興建之新碼頭、新澳氹大橋和國際機場。

與此同時，政府亦致力於社會性活動，資助社會性服務，為將近五十萬居民組織和提供教育和培訓、支持文化活動，宣傳澳門形象。

澳門若要保持其自主性和自己的發展條件，就必須善於貫徹在自己窄小領域內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戰備目標。

因而，政府應該支持各種區域性的共同創議，同時鼓勵澳門與世界各地加強企業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